

——基辛格回忆录

白宫岁月



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

第 三 册

〔美〕亨利·基辛格 著

杨静予 吴继淦 刘觉侔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Limited, 1979
根据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 政

白 宫 岁 月
——基辛格回忆录
第 三 册
〔美〕亨利·基辛格 著
杨静予 吴继淦 刘觉铸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 24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3 插页：4 字数：308,000
1980 年 11 月第 1 版 198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0

书号：3003·1614 定价：1.40 元



毛泽东主席会见基辛格。



周恩来总理会见基辛格。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六日第二次访华前夕同记者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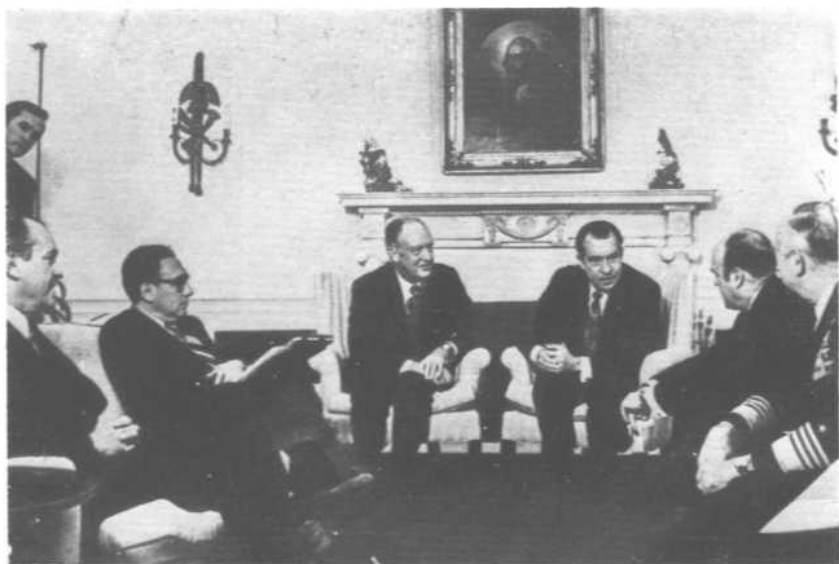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在行政大楼尼克松的秘密办公室里。



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印巴危机期间，基辛格访问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



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圣克利门蒂。



策划在老挝的作战行动。左起：
赫尔姆斯，基辛格，罗杰斯，尼克松，莱尔德，穆勒。



老挝作战行
动开始后的一次
商谈。

目 录

第十九章	北京之行.....	1
第二十章	美苏关系：在两条战线上突破	73
第二十一章	偏袒：一九七一年的印巴危机	145
第二十二章	联盟中的危机：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和 经济对抗	241
第二十三章	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的越南战争： 逼河内就范	306

DB 20/10

1970 10 10

第十九章

北 京 之 行

“李罗一号”：序曲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我经历了平生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中华民国*大使詹姆斯·沈**来见我，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持台湾的席位。沈剑虹对于国务院企图让北京进入联合国同时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计划，提了很多反对意见。我很难聚精会神地跟他详细讨论这件事，因为就在七月一日这一天，我要启程去亚洲，秘密地如约赴北京。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比台湾当局更不应当得到这种即将来临的遭遇了。它是一个忠诚的盟友，对待我们的行为一直堪称楷模。它的代表，尤其突出的是它的大使，表现得老实可靠，而且具有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精明才干。我感到我和沈剑虹的交谈特别痛苦，因为我知道，不久之后更重大的事件就要来临，他私下里议论的这些联合国程序性的花招，就会全部化为泡影。然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对他讲，而且还得要尽可能装出一切如常、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预定的问题跟他谈下去。

我的日记上记着，除沈剑虹外，我还会见了总统顾问唐·拉姆斯菲尔德、墨西哥外交部长埃米略·拉瓦萨和印度大使L·K·吉哈。我还同总统三次会晤，共用了两个多小时来重新审查我那些

* 这里指的是台湾。——译者

** 即沈剑虹。——译者

为出访准备的文件。这之后记的是夜间在林肯厅同深思熟虑的总统会晤，与认真思考问题的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会晤，共同策划战略问题。其内容多半是一些有关公共关系的无聊废话。此后一位记者要求会见，要我谈这些会议的内容。我请霍尔德曼代我接见，他同意了。“你撒谎也只能到此为止，”他承认说，这倒给道义上必须讲真话增加了一个新的尺度。实际上，虽然我在转达六月二日中国人的信息时曾在那里和尼克松谈过话，但我们却极少在林肯厅开会，而且罗杰斯从来没有在场。我们谈中国之行几乎都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或者在总统办公大楼尼克松的私人休息室里。在七月一日这一天，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对于苏联的态度以及对越南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很多时间是花在讨论未来与中国以及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先后次序上；当时我们还没有从莫斯科得到是否在九月举行会谈的消息。我们决定，不管莫斯科怎样反应，同中国的最高级会谈现在将首先举行。

这次中国之行使尼克松在公共关系方面特别敏感起来了。他作出这些决定既没有同行政部门商量，也没有同国会商量，因此，一旦出了差错，他就完全处于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困境。他极其果敢地独自作了这些决定。可是，他是一个个性复杂的人，高尚的动机往往与一些不那么高尚的考虑相矛盾。他迫切希望自己成为访问北京的第一个美国领导人；因此他三番五次地要我改变我的访问地点，除北京之外改在什么地方都行。我不知道向巴基斯坦人或是中国人怎么讲才好。我们坚持保密已经引起了怀疑。我们不熟悉中国的保卫措施和他们内部商量的情况，如果再想指定谈判地点，那很可能会使他们更加怀疑。因此我拖着不办，因为尼克松在给北京的信中可以讲明这一点——每一次信在发出之前他都是看过的，没有一次信建议在别的地点会晤。然而在我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他还催我找另外一个地方。

尼克松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宣布我这次访问的公报不要提我的名字；他希望他和周恩来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正式的中美文件上。他没有说明，宣布一位美国使者访问北京怎么能够不透露这位使者的姓名，除非这个人想在中国得到一个神出鬼没的名声。实际处理办法照顾到了这个问题。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他去中国访问之前，不邀请美国的任何政治人物去中国访问。我间接地向希拉利提了这个问题，但决定在我到达北京之前暂时不提这类请求，因为我们到北京之后情况怎么样谁都没有底，我们就更有理由这样作了。

在我出发之前大约一星期，我把我的工作人员和我编辑的文件拿给总统看。那厚厚的一册黑皮书给它一个代号叫作“李罗”，这是假借昔日访问中国的一个欧洲人的名字。尼克松仔细研究了开头的备忘录，并且亲笔在扉页上附注了意见。这本汇编开头是一个“意向篇”，它概述中国邀请我目的何在，而我们接受邀请又目的何在。

这个文件论断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是想提高他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和降低台湾的地位；这可能在我们的盟国和朋友中间造成某种混乱；苏联将会面临新的复杂情况。也许真的象许多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北京的基本目标是要美国退出亚洲；他们使我们出丑肯定会从那些强硬的革命派那里得到某些好处。但是权衡轻重，我认为不象是要采取这种做法，这样做也是同造成我去访问和邀请总统访问的那种局势不相符合的。我的备忘录写道：“我们曾经设想，他们现在这个行动部分原因是要对苏联对其边境的军事威胁作出反应。如果他们想利用我们对苏联人起某种抗衡作用，那么使我们丢脸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如像中国的宣传机构（还有美国国内的批评家们）多年来所要求的那样，美国从亚洲撤出，这也不真正符合中国人的目的，因为美国撤出亚洲就会留下真空，而

苏联人就会去填补。中国人一定会认识到，企图对我们施加压力就会引起极大的愤怒，从而加速美苏共谋主宰世界，而这一点正是他们所最害怕的。我的备忘录推断说，虽然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越来越成为他们的对手和潜在的威胁，但总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美国继续同日本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对他们还有好处。

因此，我建议，既然是国际形势促成这次访问，我这次访问就要集中讨论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讨论双方似乎都愿意加以肯定的目标的共同点。在这个范围内，我将讨论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取得某种形式的谅解，在我们双方的关系中不诉诸武力；减少我们在台湾的驻军；以及中国人对苏联的认识。我将谋求对印度支那问题能起某种节制作用的影响，并估计到，单是会晤和此后的最高级会谈这个事实本身就必定会使河内的士气大为低落。我们将谋求建立某种不依靠第三方的联系。我们无疑会遇到那种“中央王国”的复杂的病态心理，认为我们是野蛮人，是来向这个文化和政治中心朝贡的，但是只要“我们对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国家的力量具有充分的信心，”对于这类的虚荣心我们也是可以容忍的。

此外，这本情况汇编还包括很长的一篇首次发言草稿，即对各种问题的会谈要点，以及大量的背景材料。我不能断定尼克松是如何彻底审查这个材料的；他通常的做法是集中注意开头的备忘录而忽视那些辅助性材料的。

在七月一日这一天，尼克松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重新审查他在扉页上潦草地写下的那些意见上。在这些意见中，他总是用那套一成不变的强硬的词句，而我每次衔命出使，他都是用那套话打发我走的。他要我强调，如果迫不得已，他将“对越南转向强硬”。他认为我应当暗示“有可能与苏联接近”，表明我们十分懂得三角外交。他要我强调，美日继续保持同盟是减轻中国对日本的

恐惧的最好办法。尼克松所担心的事并非都属于重大政策问题。他还要我再次提出早已通过希拉利转达的那个问题，即在总统任何访问之前“严格限制政治访问者”。他要我在他去中国之前安排好粮食装运工作，这样就有助于缓和那些保守派对他的批评。他讨厌皮埃尔·特鲁多，为了发泄对他的不满，他谈到今后同中国人的接触或者联系渠道可以在任何地点进行，就是不能在渥太华。这些话大部分无非都是旧话重提，我知道，只要我把他所寄以希望的最高级会谈办好了，那些话尼克松是不会坚持的。尼克松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我们可以在纸面上写意见，但在我们见到中国人之前不可能决定任何事情。

大约在晚上八点钟我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我要先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然后飞抵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以此为跳板前往我真正的目的地。在每一站，无论我谈话的主题是什么，我都力图缓和消息公布之后即将造成的冲击。谈到乒乓外交和我们放宽贸易限制的时候，我说明为什么我们决定试图接近中国，主要强调这是全球均势的需要。我告诉英迪拉·甘地，我们仍将像尼克松主义所宣布的那样，继续反对任何核国家无缘无故的施加军事压力。我们必须等待跟我谈话的人的反应，了解这些话是否被认为是一个骗局，或者被理解为在情况许可下只能做这样的保证。

温斯顿·洛德是这次行程中的无名英雄。不仅要在他的监督下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他还要掌管在我们这伙人中散发文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因为按照了解情况的范围划分为三类。有些人了解我到什么地方去和我到那里说些什么。另外一些人知道我的目的地，但是不知道我的议程，只是帮助我到达其他各站。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知道。洛德必须保证每类人得到他们应该知道的文件和日程表，但不能得到别的。除开作这些以外，他还必须按照我的指示写好每一站的简报（我命令他作什么，总是特别

和气而有礼貌的)。他设法保持每个人对他的尊重,也保持自己头脑清醒,这确是这次旅程中不小的成就。

在整个行程中,我通过机密渠道收到华盛顿的信息,我的助手艾尔·黑格使我和白宫的焦灼情绪保持接触。霍尔德曼传达了总统的一项禁令,不许我们这伙人向国务院人员评论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事情。我询问这个奇怪的要求是什么意思,原来,霍尔德曼只是表达总统长期以来对我的工作人员的忠诚感到不放心;总统认为国务院官员对那些泄露文件的人是同情的,他怕我的工作人员助长这种同情。在我离开华盛顿前几小时,罗杰斯曾表明他从官场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想利用我不在的机会,得到总统的授权,让乔·西斯科去中东一行,进行另一轮的谈判;其实当罗杰斯的备忘录到达白宫的时候,两位密使已经出发去开罗进行初步接触了。十分明显这是要花招。我从西贡打电报说,这样去中东,现在只会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应予推迟。我建议,在我回来之后立即安排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中东问题。总统同意了这个建议。

对于呆在华盛顿的那些人来说,等待显然是一件更加折磨人的事情,由于我们正在忙的不可开交反而不着急了。我三番五次地接到训令,还是我在出发前跟我讲过不知多少遍的那些话:公报中不要署名;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白宫了解到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在我刚到达的时候将去北京访问,这一场虚惊,就非同小可。根据这一“可疑的事态变化”,就嘱咐我在下一站(新德里)设法紧急通知我的“主人”(这是中国人的化名,是精心选定用来迷惑那些通讯人员的,因为在这一段中前面已经提到北京),要他们推迟赖斯顿的访问,或者向我作出“必要的保证”。我不能想象,走进北京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怎能不引起至少是某些印度人的注意。因此我回电说:“至于赖斯顿,主人的决定不会因我的抗

议而受到影响……我断定他们能保守秘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七月五日当我还在曼谷的时候，黑格告诉我伏龙索夫已经递交了我们等待已久的苏联人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复信。他们现在建议从原定的一九七一年九月推迟到这一年较后的日期；即使到那时候，也还是有条件的，这要看正在进行的一些谈判的情况而定，并且“假定”在这期间不任何事情使局势复杂化。苏联人再一次无意中为我们作了件大好事；他们机关算尽，反害了自己。克里姆林宫的复信使我们摆脱了那种复杂的局面，我们不必同时应付两个最高级会谈了。我们首先同中国举行最高级会谈，莫斯科不能责怪我们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摩擦减低到最低限度来完成我们的计划。

我给黑格打电报说：不要给伏龙索夫回信，驻波恩大使肯尼思·鲁斯在我回来之前应该寻找某种借口避免继续进行柏林谈判。我说，我认为苏联的复信“并非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与苏联的最高级会谈可以晚些举行了，而且将是在好得多的心理状况下举行。苏联的复信使尼克松大怒，并且想办法要报复。我劝他不要有任何激怒的表示，甚至不作任何反应。如果我们采取“不动声色”这一着，其结果很可能对我们有利；我们再也不能“一味地赌气”了。我深信，未来十天将会给对方以有力的回击，比我们任何正式的答复更有效。

华盛顿忧心忡忡，超级大国勾心斗角，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飞往伊斯兰堡。我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密电由法兰经过不懈的努力精心策划的。每次联系都是用化名，那些化名也许能愚弄五岁的孩子三分钟（我的化名是“首长”）。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我摆脱到处遇到的高级官员礼节性的拜访。我们原来的想法是，要叶海亚表面上邀请我到山间别墅进行秘密会谈。这样作的缺点是，我就不得不把停留的时间定为七十二小时。当

时，东巴基斯坦的内战正在激烈进行，大批孟加拉难民涌入印度，在巴基斯坦比在印度多呆一天就会被理解为偏袒巴基斯坦，从而引起新德里、我们的官僚机构、新闻机构、尤其是我们国会的反应。那样作叶海亚就得两天不露面，这就有从巴基斯坦方面泄露机密的风险。而且完全为了打掩护而利用一个国家元首，这无论如何也是不恰当的。

我建议，我们公布一张行程表，我在巴基斯坦只停留四十八小时，从七月八日到十日，大致相当于我在印度停留的时间。到达之后我就声称肚痛，请大使馆诊所给我治病。我要装得越痛越厉害，这样叶海亚总统就会在晚宴席上邀我到位于纳蒂亚加利山上的总统别墅去休养。以此为借口，我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而有两天的时间，可以暗中往北京一行。但这样作还是不象看起来那么容易。如果我“病”了，我们怎能阻止大使馆的医生赶来照料我呢？我们又怎能限制经过多年外交工作训练的大使馆人员不一天二十四小时听候我的指示呢？我们的聪明的大使想到一个解决办法，最好用他自己的密电概述如下：“大使馆的医生不再是什么问题。他于七月六日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大使馆的护士很好对付，她不会自动的闯进来。使馆副馆长七月七日休假离开；美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七月二日回国休假。其他人都好办”。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长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总统代表来访而把他的全部要员赶出城去，居然引以自豪，而且他还因为很有办法而受到华盛顿表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我是个凡人，竟然如此放肆，天神决意要惩罚我一下；在新德里，我真的肚痛了起来，我只好暗暗忍受，否则的话，到了巴基斯坦，岂不信誉扫地。）

我们的计划甚至还规定了万一被人发现之后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就要由白宫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声明如下：“基辛格博士应中国人的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会晤。在基辛格回来

并向总统汇报以后将发表一个声明。”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声明能否平息一场轰动，我是不抱什么幻想的。

我在伊斯兰堡完全按照原定计划行事。在法兰大使的官邸与使馆留下来的人共进午餐，与叶海亚总统会晤，在大使馆简单介绍情况，然后又出席了叶海亚及其高级官员的便宴。叶海亚由于那年十二月的印巴战争而被推翻下台，这是他下台以前最后一个欢乐的日子，而我之到来是使他感到高兴的原因。叶海亚对这种警察追强盗般的复杂而冒险的计划安排很感兴趣。他亲自检查了我秘密离开的每一个细节；他向我们提供他的政府的所有便利条件，并把他所信任的自己专用的飞机驾驶员供我们使用。与当时许多报刊的说法相反，他并不要求任何报答。他对我们殷勤接待，但在东巴基斯坦的动乱中并没有得到我国政府同样宽厚的对待。叶海亚是一个粗率、直爽而缺乏谋虑的军人，他在东巴基斯坦的动乱之后受到牵累，他对于那些事件，是既无经验又少锻炼的。他铸成了大错。但他对我国帮了大忙；必须指出，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正直高尚的。

叶海亚总统在招待宴会中开始执行我们的计划。我的肚疼成了大家的话题。他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我复原；他一定要我到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去休养，这个别墅靠近总统的宾馆，位于穆里以北的群山中。当我迟疑表示不同意时，他坚持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其实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得恳切异常，以致我手下一个特工人员听到之后，立即派了他一个同事前往该地，作为“先行”去了解情况。到半夜十二点钟左右，这位特工人员打电话来，显得很狼狈；他已勘察过该处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我们无法可施，只好要求巴基斯坦人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扣留在那蒂亚加利，直到我从北京回来。